

父亲二三事

林海

父亲离开我已整整三年,今年注定又要经历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了。

三年前,父亲不慎摔倒,卧床一年有余。一天早晨,我喂过父亲早饭后,发现父亲眼角淌下两行热泪,眼里闪动着求生的光亮。他的眼神和泪水一下子触动了我心灵深处的那根神经——父亲给了我生命,可是在他弥留之际,我却无力回天,这是多么无奈、多么残忍的事情。我心如刀绞,忍不住转过身去……

父亲林亲先,1.81米的个子,浓眉大眼,四方脸,用现在人的说法,简直是酷毙了、帅呆了。上世纪60年代末,我在家乡上小学,父亲担任生产队政治队长,他的大公无私和铁面无私是出了名的。

一个秋日傍晚,夕阳西下,沉过嵩山顶,我跟几个小伙伴放学后,跑到村西“南子沟”的地瓜地里,看大人们分地瓜。他们有的在刨,有的在分,我们几个小伙伴在玩耍疯闹着,满地乱跑,跑累了,口渴了,就跑到地瓜堆里,每人拿起一个地瓜,在“地隔子”(地沿)边的青草上把土擦掉,刚要吃,正在领着社员分地瓜的父亲看见了,远远喊:“小海,你在干什么,谁让你随便吃集体的地瓜了?”他这一声喊,把正在兴头上的我们几个小孩子吓住了,我们赶紧把到了嘴边的地瓜扔进地瓜堆里。我心里很不服气,不就是一个地瓜,至于吗?

多年后,我跟父亲说起这件事,戏谑他小题大做,太过认真。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:“小海啊,咱不能贪集体的便宜。不贪不占,咱活得踏实,等老了也心安。”

老家百年老宅沿袭先人规矩顺山而盖,九间正房后是村里从本家亲戚手里买下的房屋。20世纪80年代初,村里经常在院子里晒海参,我家两扇后窗正对着后院。

一天傍晚,我正巧在家,忽然听见后院一阵刺耳的叫声,循声望去,原来是我家大黄猫在跟一个大黑猫打架。两个家伙互不相让,大黑猫一下子跳到我家大黄猫身上,滚成一球。

我怕我家大黄猫吃亏,一个高跳到后院,迅速将大黑猫赶走,然后兴冲冲地从后窗爬进家。刚落地,恰巧父亲散工回家,见我后窗跳进来,立刻面有愠色,“小海,你跑后院子干什么去了?”

“赶猫去了。”

“没拿海参吧?”

“没拿。”

父亲见我不高兴的样子,知道冤枉我了,赶紧陪着笑脸,说道:“千万别过去拿海参哈。大队在这里晒海参,就是对咱家人的信任,咱要对得起这个信任呀。”

父亲一辈子重情重义,重视亲情。他19岁时,就跟着在东北辽东省(后与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)担任省长秘书的本家大伯父林英离开家乡。父亲知书达理,心灵手巧,记性超群,很快被任命为四平市商业局销售科长。

回乡期间,父亲目睹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,十分振奋。恰巧当时国家大力提倡支援农村建设,父亲便辞职回到家乡长岛县嵩前村。回乡后,父亲从未忘记远在东北的大伯父一家人,每年都有书信往来。他在担任北长山乡供销公司经理期间,每逢出差时,都要带着家乡的特产去看望林英大伯父他们。大伯父每隔三五年也会携同大伯母回乡住上几日。

后来,林英大伯父病故,父亲就按照他生前的愿望,接他魂归故里。父亲生前,逢年过节都要带领我们兄弟几个为林英大伯父上坟祭奠。如今,故人不在了,亲情犹存。我和弟弟每年逢年过节都会像父亲那样上山拜祭。

孤月影下,倍思亲人。父亲,夜空里那么多星星,不知哪颗是您,您可看到了家乡,看到了我思念您的眼睛!

父女战争

张凤英

在我很小的时候,父亲让我叫他“爹”,这个很土气的称呼经常引起小伙伴们的讥笑。可是父亲说:这是中国传统的叫法,中国人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。由于父亲喜欢男孩,我经常和他发生“遭遇战”。

有一年冬天,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老家,正在上学的我只能跟着父亲在单位吃饭。那天中午吃饭时,有个叔叔讲了一个黄段子,大家都哈哈大笑,我也跟着笑了。父亲突然对我大吼一声,一把夺过我的饭碗,接着是一个响亮的耳光。从此,父亲再也不让我到他单位吃饭了,他容不得自己的女儿看见和听见那些不文明的东西。

父亲是从农村出来的,他对土地的热爱是根深蒂固的。他在车站边的荒地上种了芸豆角、萝卜、白菜、谷子和土豆等作物,每到秋天,父亲就白天上班,晚上收割。我是他的帮手,收回的谷子需要用大板车往回拉。父亲在前面拉,我在后面推。看见父亲汗流满面,我难过了。有一天拉白菜,我鼓起勇气接过父亲的大板车拉起来,不一会儿,肩膀就火辣辣地疼,但我对自己说:今天决不能示弱,一定要让父亲知道我和男孩子一样能干。就这样我把那一车白菜拉回家。到家后,母亲掀开我的衣服一看肩膀都出血了。父亲却笑了笑说:还行,不比男孩子差!那一刻,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又流出来了。

我14岁生日那天,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根竹子扁担。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:“从今天起,给家里担水的活儿就是你的了。我像你这么大时,早就给家里担水吃了。”我试着担了半桶水,还行,没出洋相。父亲说:“慢慢来,多练习,时间久了就习惯了。”

17岁时,我已经长大了。有一天身体不适,肚子疼,趁着父亲不在家,就指挥两个妹妹抬水。没想到,两个妹妹抬水回来的时候,正赶上父亲下班回来。两个妹妹你推我搡争吵起来,故意弄得动静很大。父亲顺手拿起擀面杖打了我。我气愤之极,一口气从家里跑了出来,踏上了南下的列车,打算离家出走。可是上车不一会儿,就被查票的叔叔赶下了车。无奈之下,我硬着头皮往家走。那时,天已黑了,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,忽然听见母亲和父亲吵架的声音。原来他们是出来找我的。母亲边哭边说:“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,我也不活了。这么大的姑娘了,你一个当爹的还打她,她那么要强,要是一时想不开……”听到这里,我顿时泪流满面,冲到母亲身边,抱住母亲大哭起来。

从那以后,我认定父亲是不爱我的,想着早日离开这个家,于是当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人的时候,我义无反顾地报名走了。到达内蒙古以后,我一直不给家里写信。父亲日夜盼着我的来信,一直盼不到,担心我出了什么事,不到一个月头发都白了。后来通过战友和同学,父亲知道了我的地址,三番五次写信给我后,我才给家里回了一封信,随信寄了40元钱。父母接到我的信和钱,双双落下了眼泪。这一切都是后来才知道的,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!

后来我考上大学,离开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,父亲为我很是骄傲了一阵子。他对邻居说:“一中有一百十号人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,只有我闺女考上了大学,那是百里挑一啊!”可是邻居大爷说:“只可惜啊,是个丫头。”我爹听了,不再言语,回来对我妈说:“闺女结婚的时候,婆家必须拿出她这几年上大学花费的钱来,不然我不是白白为婆家培养了个大学生媳妇吗?”

结果我结婚的时候,父亲真的向婆家提出了500元的彩礼钱。不巧的是,我的婆家养了一窝儿子,穷得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更何况我也不愿意要这份彩礼,就对父亲说:“谁说我家出嫁以后就不是张家的人了?第一,我每月会按时寄钱回来;第二,我的儿子会跟着我姓张的。”父亲大声问:“此话当真?”我说:“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。”从此,我每月都给父亲寄钱,儿子出生后也姓张,父亲的心里才舒服了。

在我们家我排行老大,虽然出嫁了,但我仍然承担着老大的责任,每一个弟弟妹妹结婚,我都给予资金支持,逢年过节还给父母寄礼物和钱。

2007年父亲病重,我给他寄了7000元钱。后来父亲写信对我说:“30多年了,你一直信守当初的承诺,养你这样一个女儿和养个儿子是一样的,如果有来生,我还要你做我的女儿。”看了这封信,我又像小时候一样泪如雨下。

其实,父亲在我36岁当了大学讲师以后,就再也没有嫌弃过我是女孩了。他退休后回到太行山老家,每当收到我寄来的书,他都骄傲地对村里人说:“这是我闺女写的书,上面还写着她是咱们阜平县的人呢!”

本来,我以为对于父亲的养育之恩,我一直在努力地报答,可是在父亲病危的日子里,当我从千里之外回到故乡,看见病床上骨瘦如柴的父亲,我抱愧得无以复加。父亲病成这样,伺候父亲的都是弟弟妹妹。父亲已经走了九年了,每年父亲节的时候,我都想对父亲说,“爹,来世我还要做您的女儿!”

父亲的独轮车

林春江

在我家的后院,靠北墙倚着一辆独轮车。它是用赤红色的铁管焊接而成,中间凸起,细长的银色车辐条,沉重冰凉的车把,中间系一条土黄色的宽绳,看起来粗笨简陋,但父亲的这辆独轮车,推起了山尖般的花生苞米,推起了一家人的衣食住行。

少年时,喜欢跟着父亲去前沟薅花生。我推着小车,父亲推着大车。薅完花生,父亲领着我,将饱满圆润的花生连同绿色的藤蔓,一趟趟从地里抱出来,在独轮车上整整齐齐摆放好,用粗麻绳左缠右绕。“扎箍”好车子,我在一旁紧紧地扶着,父亲提起膝盖顶牢,狠狠一勒,粗绳深深陷进花生垛的中间。我弯腰奋力提起沉重的车把,将黄绳套在脖子上,小心迈进一步,顿时,小腿肚子打颤,被压得直不起腰来。只得赶紧放下,推起我的小车。父亲笑着接过来,我尴尬地挠挠头,推着小车急走几步,来到一个下坡,我用脚蹬住地面,拽着车把,身体努力后仰,食指中指勾紧车闸,在“吱嘎吱嘎”刺耳的摩擦声中,一车花生缓缓移动,好不容易蹭到山脚下,出了一身大汗。放稳小车,歇口气,见父亲还没下来,急忙往山上跑。拐过一个急弯,父亲推的独轮车缓缓而来,我跑上前,用后背顶着一车花生,慢慢往前走。父亲将车子停在平坦处,坐在地上小憩。大颗大颗的汗珠啪嗒啪嗒落下来,砸进土里,身上的粗布衣服全被浸湿了。

那些年的“国光”“北斗”苹果树刚刚结果,村里和镇里没有果品批发市场,大人们商量推着独轮车去市里售卖。我央求父亲领我一起去。父亲将独轮车的前梁系上一根粗细均匀的麻绳,打好活结递给我,拍拍我的肩膀说道:“江儿,别用蛮力,平道下坡松一松,上坡时紧一紧,腰腿发力,用肩膀拽拉,不要用手。”他温和的眼神里,满是鼓励和信任,我点点头,默默地将活结套在肩膀上。这一刻,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。捆绑好四筐苹果,我们上路了,一开始,一马平川,很轻松,父亲轻快地推着独轮车,麻绳松松垮垮的。

快到东厅时,遇到一段长长的斜坡,我俯下身子,黄胶鞋紧蹬地面,弓腰弯背,使劲用肩膀拽紧麻绳。三百多斤的苹果缓缓朝前移动,蓦然回首,只见父亲向前倾着身体,粗壮的胳膊青筋凸起,黝黑的脸庞上汗水如注,黄色的宽绳紧压着他的脖颈。我的眼里升腾起一层雾气,回身攥紧麻绳,拼命拽拉。好不容易抵达福山,我们再也走不动了,就在一家商场前,支起了摊。快到中午时,卖出了两筐。父亲很高兴,掏出五块钱,让我去买点吃的。捏着五块钱,往北走了五十多米,发现有卖油条的,就买了十根,跟老板要了一点儿咸菜,用油纸包着,拿了回来。

我们爷俩席地而坐,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油条。父亲吃了四根,用粗大的手掌抹抹嘴巴,对我说:“我吃饱了,剩下的你都吃了吧。”饭后我倚着独轮车打盹,不一会儿,倦意上涌,沉沉睡去。醒来后,只见落日余晖,晚霞渐染。我的身上,披着父亲的粗布上衣。扭过头来,仅穿一件灰秋衣的父亲强打精神,眼睛里布满血丝,在风中等待买主。这时,走来一名身着中山服的中年人,问什么苹果,怎么卖?父亲欣喜地告诉他,中山服沉吟片刻,说道,跟我走吧。原来他是一家工厂的采购员,他全要了。回家的路上,我推着独轮车,父亲卷起一袋旱烟,美滋滋地吸着,路途漫长,橘黄色的路灯,拉长了我们的身影,我和父亲脚底生风。

十多年前,父亲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,那辆独轮车光荣“下岗”了,放在后院的西北角。父亲用几块石棉瓦搭起一个简易的“帐篷”,为它遮风挡雨,它倚着墙角,默默无语。独轮车虽然风光不再,但在它身上,浸润着生活的酸甜苦辣,铭刻着难忘的经历,见证了农村的蝶变。